

# 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作者 哈瑞·刘易斯（前哈佛学院院长）

译者 侯定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失去灵魂的卓越

##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作者 哈瑞·刘易斯（前哈佛学院院长）  
译者 侯定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美)刘易斯(Lewis, H.)著;侯定凯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617 - 5419 - 1

I. 失… II. ①刘…②侯… III. 哈佛大学-学校教育-研究 IV. 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1076 号

## 失去灵魂的卓越

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撰 著 哈瑞·刘易斯  
译 者 侯定凯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彭呈军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cl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8.5  
字 数 30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419 - 1/G · 3179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请记住：我们的大学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它拥有辉煌的历史。发展道德和智力是我们的主旋律。大学的发展和真正福祉从来都是与我们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这座大学至今取得的所有伟大成就，都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亨利·希金森(Henry Lee Higginson)

1901年10月15日在介绍哈佛学生联谊会  
(Harvard Union)时的讲话

我们需要通过享用自由来考验这个自由的文明社会。但是如果我们以自由之名不务正业，或碌碌无为，或汲汲于一己之利，那就是文明社会的失败——我们的国家如此，美国的大学更是如此……建立文明社会的斗争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车间、课堂、实验室、图书馆里……建设文明社会最关键的，是把青年培养成为能造福世界的人——他们不仅需要创造富庶的物质世界，更需要成为精神世界的楷模，需要通过教育让他们达到至真至善的境界。

A·劳伦斯·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

1916年给耶鲁新生的讲话

## 中文版序言

现在中国的学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机会。今天,中国的大学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工厂”。中国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思想家遍及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杰出的智慧和发现建设着现代世界。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这些人最富创造力的职业生涯也是在海外度过的。随着中国不断走向开放和现代化,中国的大学面临重大的变革机遇。

只要改革道路正确,中国的大学就能够像美国的大学一样,成为社会繁荣的“发动机”。中国的大学可以通过自身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通过向所有富有才能和抱负的人们创造就业前景,中国的大学能够不断促进社会流动。

本书分析了哈佛及美国其他著名大学的教育问题,也回顾了这些大学几个世纪来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因为我熟悉哈佛,还因为哈佛一直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学,书中绝大部分笔墨集中在对哈佛大学的分析上(虽然其中也不乏批评)。但自从本书英文版面世后,通过和其他大学许多教授和院长的交谈,我发现他们也正面临和哈佛同样的问题。

本书的宗旨是回顾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历史,并展望其未来前景。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超越了学科的专业技能。通识教育旨在利用大学生的可塑性,鼓励年轻人认识自我,并发现自己的生活道路。通识教育的任务还在于提醒学生:自己应对社会知恩图报,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

在美国,很多大学丧失了这些远大的教育目标。我们在本科生身上寄托的期望太少了。有时,我们认为只要学生高兴,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仿佛我们是在饭店里向学生提供餐饮服务。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提醒美国人民:我们在教育

## 失去灵魂的卓越

---

中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任务——大学原本应该为社会培养原则性强、受人敬重的领导人；应该培养学生重要的价值观、性格、道德，让他们愿意为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学习。

本书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新的课程计划重新强调了哈佛曾经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这一计划的起草者提到，新课程制定过程中得到我这本书的启发。如今，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有望重新点燃几乎要放弃的理想了。

2007年1月，我有幸访问了上海的一些大学，并有机会和那里的官员、大学教授、学者和学生进行了交流。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发表的演讲感兴趣，他们对大学未来发展的洞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此，我可以简单地概括本书对于中国大学可能带来的启示：中国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格和对自己的社会责任的理解力吗？中国大学应该解放学生的心灵以便让他们决定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吗？如果中国大学课程强调了通识教育，大学生将变得更有创造性、更富想象力吗？西方大学的经验告诉我，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哈瑞·刘易斯

2007年3月4日

## 致 谢<sup>\*</sup>

本书是我三年写作的成果。在此,我要感谢波士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 ix 我提供写作场所,特别要感谢这两所大学的阿泽尔·贝斯塔夫罗斯(Azer Bestavros)和哈尔·阿贝尔森(Hal Abelson)两位教授对我的款待。我写作最集中的一段时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里度过的,我与那里的同事相处得很愉快,他们给了我写作的动力。

正如本书结尾处的注释所示,在研究过程中我参考了大量资料。哈佛大学档案馆让我便捷地获得许多原始文件。档案馆在其网站上刊载的“哈佛校长报告”是一个丰富的信息库。特别是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和弗雷德里克·兰多夫(Frederick Rudolph)所著的《课程》(*Curriculum*)为我提供了关于哈佛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在大学体育问题方面,罗纳德·史密斯(Ronald A. Smith)的《体育与自由》(*Sports and Freedom*)、大卫·扬(David C. Young)的《希腊业余体育的奥林匹克之谜》(*The Olympic Myth of Greek Amateur Athletics*)、保罗·韦斯(Paul Weiss)的《运动的哲学分析》(*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都给了我很大启示。本书大量的引文来自《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哈佛大学公报》(*The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以及其他一些报刊的在线档案。我尤其要感谢《哈佛深红报》提供的开放式档案材料和几十年来关于学生新闻的纪录。在哈佛学生生活报道方面,《哈佛深红报》是最忠实的记录者。随着哈佛校长报告发布制度的终结,《哈佛深红报》承担起了大量学校事件

---

\* 本书中,英文版原著的页码标注在页边空处。——编辑注

的报道任务。

本书的开篇和各章开头的引文，都出自与哈佛有渊源关系的人的言论。其中一些在哈佛的身份不广为人知的作者，我作了特别说明。

我的院长道路离不开众人的指引。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多年来与我同事的  
x 副院长、院长助理、资深辅导员、学监和辅导员们教给我的一切。他们是最理解哈佛这所学校和哈佛学生的人。我要向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已故的约翰·马奎德(John Marquand)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出版前，许多人都曾经审阅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我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员：弗雷德·阿伯纳斯(Fred Abernathy)、卡伦·埃弗里(Karen Avery)、查尔斯·杜西(Charles Ducey)、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瓦苏吉·盖恩斯汉纳森(Vasugi Ganeshananthan)、安妮·格林(Anne Greene)、F. 贾维斯(F. Washington Jarvis)、卡兰·罗达(Karan Lodha)、詹姆斯·麦卡锡(James McCarthy)、约翰·麦格雷格(John McGrath)、迈克·米泽马赫尔(Michael Mitzenmacher)、伊丽莎白·内森斯(Elizabeth Studley Nathans)、杰夫·奥林斯(Jeff Orleans)、乔治·彼德(George Peter)、里奥·瑞辛(Leo Reyzin)、彼德·罗比(Peter Roby)、哈尔·斯各特(Hal Scott)、哈维·席尔瓦格雷特(Harvey Silverglate)约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苏姗娜·托宾(Susannah Tobin)、迪恩·惠特拉(Dean K. Whitla)。一些审阅人不希望在这里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我还是要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我特别感谢我最喜爱的两位哈佛学生——她们是我的女儿——安妮·刘易斯(Anne Lewis)和伊丽莎白·刘易斯(Elizabeth Lewis)。因为她们深知本书的作者和哈佛学院，她们提出的意见对我的帮助颇大。我的弟弟理查德·刘易斯(Richard Lewis)对学生分数和衣服尺寸作了类比，而帕默拉·刘易斯(Pamela Alan Lewis)为我指出了衣服尺寸方面的知识。我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我的妻子玛琳·刘易斯(Marlyn McGrath Lewis)为我指明了哈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在我任哈佛学院院长及本书写作过程中，她给了我无尽的爱和支持。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不知是出于信念，还是因为一时糊涂，约翰·泰勒(John Taylor)同意做我的出版经纪人。我对他表示感谢。感谢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Affairs)的彼德·奥斯诺斯(Peter Osnos)对于本书出版寄予的信任。感谢本书的编辑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和林德塞·琼斯(Lindsay Jones)。没有他们的工作，本书不可能问世。林德塞凭借其编辑专业能力，润色了我的书稿，并保证我的写作顺

## 致 谢

---

利杀青。

我愿意为书中所有的错误之处承担责任。读者不能认为凡是出版前审阅了本书的人，都同意我那些糟糕的论点和失态的言辞。

在任院长期间，我与许多出色的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有时我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包括杰里米·诺里斯(Jeremy Knowles)和尼尔·陆登庭(Neil Rudenstine)——但他们深知，只有人们自由地交流思想，并彼此怀有敬意地展开辩论，大学才能强大。在哈佛，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人很少，对此我深感欣慰。

## 英文版序言：大学忘却了什么？

美国一些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仰慕的对象。几十年来，在 xi 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大学一直是发明和创造的源泉。因此，人们把有抱负的年轻人送到这些知名研究型大学的本科学院读书，并将这视为无上荣幸的受教育机会。大学里研究与教学的结合，让那些最杰出的专家与最有前途的学生面对面接触。在那些顶尖大学里，教师与学生所取得的成就一年比一年突出。无数个家庭都梦想自己的孩子能考入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斯坦福大学。这些家长认为，被这些学校录取，就是对孩子成就的认可；进入这样的学府，未来美好的前程就有了保证。

那些校友经常感叹如今大学所发生的沧桑巨变——与当年他们就读大学时相比，有更多的女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进入了大学课堂；大学生的社交和性生活变得如此的随意了；又有多少新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拔地而起；大学的学术水平又下降了多少。而事实上，本科教育的基本架构依旧如故。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生命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了这些知名大学。当想到如今这些大学的中心地位依旧如往昔，甚至比过去更出色了（因为学校拥有了更出色的学生和教师），他们内心充满自豪。我们更愿意保持稳定，即使我们鼓足勇气展望未来时，我们也不情愿做出重大变革。远程教育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创意，但是那些挂满常春藤的宿舍和教室，依旧是作为常春藤大学的一个标志。在一些地方，大学体育或许已经失去了控制，但如果一所大学没有一支橄榄球队，就如同早餐只吃羊角面包一样，被人看作与时代格格不入。在古老的知名 xii 大学里设立学院是美国模式，即使再怎么进步，这些“美国模式”总是希望保持其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突出形象。

然而，老校友们的观察没有错。这些古老的学院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比校友们在重新聚首时看到的学校新色彩和建筑要深刻得多。旧的学校机构保留下来了，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课程内容比以前更加丰富了，但课程已不再围绕那些普遍认同的理念来设计；教授们依旧在给学生们打分，但这些分数已经演变成为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资格，而不是教师向学生提供的教学反馈；纪律制度已经演变成可以辩论的“小小法庭”，而不再是进行道德教育、帮助年轻人成长、培养具有责任感公民的途径。因为需要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漫长的赛季，校际体育比赛似乎也违背了原先锻炼学生心智的初衷——相反，这些比赛都是由专业运动员参加，没有趣味可言。他们从事这一行，是因为只有加入运动队，他们才有机会进大学。

简言之，大学已经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现在学术追求替代了大学的教育任务，殊不知这两者不应该厚此薄彼。形式上教育还在延续，比如学校设立了教学奖励制度和各种学生服务项目；一些教授还是希望成为师德高尚的名师。审视一下任何大学领导的演讲稿，你会发现其中不乏关于“世界问题”、“知识探索”、“勤勉工作”与“成功”之类的词句。我们却鲜有看到个人力量、完善的人格、善良、合作、同情、如何把眼前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等方面的言辞。学校越出名，就越强调在教师、学生和经费市场上的竞争力。在这些学校，人们很少严肃地讨论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让他们明白：如今受到的良好教育，部分应归功于这个社会。

xiii 在我担任哈佛学院院长时，上述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在哈佛。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我自己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或者制造了新的问题。2003年我卸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潜心于我的教学和研究。本书就是根据我担任院长期间的所见所闻写下的心得。时过境迁，希望当我们回首这些问题的时候能获得一些新知——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这些问题成了顽症？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从1974年算起，我在哈佛做教授已经30年了。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教学、课程、评分、体育、学生行为不端对策方面的言论，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教授在讨论如何把学生培养成材的言论。总是有人在提醒教师注意有情绪低落倾向的学生，并把他们移交到学校精神卫生中心接受帮助。而大多数学生最需要

的不是心理咨询，而是需要有人给他们指明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向。校长、院长和教授们很少告诉学生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若不进行深思熟虑，以往那些将学生带进大学的策略和勤勉的精神，现在可能将无法带领学生走进更有意义的成人世界。

以我供职的哈佛大学为背景，我把对高等教育的探析建立在哈佛环境下的事件和数据基础之上。然而，在哈佛发生的一切同样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就任何一所其他知名大学的情形撰写一本类似的专著。从某些方面来说，哈佛有其独特的一面：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或好或坏地，在许多方面它为其他大学树立了典范；它的形象在公众的心目中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在这里呈现的哈佛的面貌，或许具有典型性，或许只是一种极端情况。但其中的内容都是真实和有目共睹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学校发展的大势。

本书中，我分析了哈佛以及其他名牌大学是如何忽视本科教育最基本目标的。教育不仅仅是数据、公式、法则、名字和地点的传授。事实上，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学质量通常是相当不错的，但并非所有的大学都如此。不管学生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当他们在25周年聚会，再次拿起当年的笔记本时，他们发现那些记录的内容都已经忘记了。学生们更容易记住的是某一名优秀的教师，而不是他当时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不管如何，校友们还是说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受益匪浅。用多明哥斯(Jorge Dominguez)的话来说，通识教育就是：当你接受了教育，又把当初学到的内容忘记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如今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呢？

18到22岁是年轻人在人生发展道路上的特殊阶段。这些年轻人离开家庭，可以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他们已经能够成熟地从独立的生活、新的知识和富有挑战性的观念中获取力量和灵感。理论上讲，大学就是学生开始认识自我、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场所。他们所处的年龄正好是培养责任感的阶段——学生从父母亲的依赖那里独立出来，开始为自我和社会承担责任，年龄在17岁以下的学生，尚不能适应大学提供的独立的生活，而年龄在二十好几的学生又不能充分利用学校环境，实现自我的重大转变。虽然现在大学生的年龄在有意无意间发生了变化——已经超越了个体发展的最佳时机，但大学似乎对影响学生生活的机会还是视而不见。

大学已经具备了帮助学生发展的条件。它们为教授们创造了舒适的日常生活条件。在顶尖大学，财政支持非常充裕、慷慨，学生无须支付大笔学费。进行

真正教育的硬件都齐全了,但为何知名研究型大学里的学院会迷失教育的大目标呢?

本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产生过程、原因及结果的。进入大学之前,学生的人生已经过家庭和学校的塑造,大学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于继续塑造这些学生,使其成为富有学识、智慧、能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成年人。这样的局面不可能永久存在,但如果这些知名大学要实现自己的使命,就必须在本科教育中重新注入理想主义的理念。

#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致 谢	3
英文版序言：大学忘却了什么？	7
导 言：不实的卓越	1
第一章 选择与方向	17
第二章 知识精英与公民意识	37
第三章 沟通、竞争与合作	61
第四章 咨询：永恒的主题	77
第五章 为什么分数在上升	91
第六章 评价只是教育手段	106
第七章 独立、责任感、性侵犯问题	126
第八章 学生与金钱	167
第九章 大学体育与金钱	183
结 语	219
注 释	233
附录：哈佛大学现行各学院结构图	276
译后记	277

## 导言：不实的卓越

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外强中干，坐而论道。

——埃里奥特(T. S. Eliot),《不实之人》

(*The Hollow Men*) (1925)

**大**学是复杂之地，它发挥着各种相互矛盾的职能。在社会大众眼里，大学是一片净土。毫无疑问，大学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很难有准确而规范的答案。但是如果能够观察大学是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斗争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是问题的根源，哪些不是。

大学面临的难题难究其根源。虽然大学的衰落可以归咎于机构丧失了意志，或归咎于教师的懒散。金钱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许多问题有其历史根源。它们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它们涉及价值冲突，且矛盾各方找不到均衡点。大学对自己所做之事缺乏信心，它们不知道如何在大学教育使命的大背景下思考这些问题。

本书主要回顾我在担任院长期间，哈佛学院所面临的种种矛盾。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我们怎样教育学生？教给了学生什么？如何给学生打分？打分的依据是什么？在培养学生责任心方面的成败得失是什么？金钱对学生有什么一般性的影响？金钱对大学发展体育运动有何特别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它们历久弥新，仅就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大学时刻都处于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面对这些问题，大学有时认识清醒，有时则不然。如今，我们痛心地看着自己正在失去主张。

无论著名大学还是不起眼的大学，都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今天没有几所大 2

学能自诩自己办学理念明确。其实,目前这些大学表现出的种种不实之举,暴露出大学缺乏办学的智慧。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有原则性的大学领导。

**教学:**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教学涵盖了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向学生传授的所有课程。课堂是教学的一个方面,但还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学生咨询活动以及师生互动。大约每隔 25 年,大学就会对所有课程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课程改革成为大学教育体现学术发展和社会需要的良机。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课程改革的方向,可以反映大学在培养学生世界观过程中的基本理念。

哈佛最近的一次课程改革始于 2002 年,此时正值经济学家、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就任大学校长一年之后。自 1862 年费尔顿校长(Cornelius Conway Felton)以来<sup>①</sup>,萨默斯校长波折不断的任期是最短的了。2006 年 1 月一个周五的晚上,据说是在萨默斯的一再坚持下,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被迫辞职。几周后,萨默斯自己也在文理学院对他的决断、管理以及其人格的怨声载道中辞职了。与此同时,几个课程评估委会对有可能在春季实施的文理学院新课程计划提出了建议。一些教授们抱怨课程改革缺乏新意,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另一些教授们赞成课程改革,认为新课程对教授或学生都没有提出太高要求;也有一些教授认为在学院一片抱怨和管理混乱的环境下进行课程变革的做法不明智。

从一开始,科学的发展和全球化推动了哈佛的课程改革。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科学和全球化将继续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哈佛将这些社会发展的主题置于本科教育的核心,但课程改革忽略了人文知识的重要性。同时,分门别类的学科成为本科教育课程的基本构成要素,似乎学生读大学就是为了将来进入商业、法律、医学等领域就业,而在哈佛学院接受的教育与这些目标关系不大。经济动  
3 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这导致大学的指导思想失去了根本的教育宗旨及其与社会的联系。我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为人;我们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

---

<sup>①</sup> 费尔顿为哈佛大学希腊文学教授,1860 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第 20 任校长,直到 1862 年去世。——译者注

样的；我们忘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社会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

2006年初哈佛课程的自我评估前途未卜。发布的研究报告承袭了美国政府官样文章中最糟糕的措辞方式，鼓吹哈佛的教育目标是“促进知识拓展和跨学科学习的机遇”。归根结底的意思就是：哈佛学生随便学点别的什么，都要比学习哈佛课程本身强。哈佛就像是处于一帮争吵中孩子的母亲，看着32个系及其下属的无数专业，却说要平等对待，没有偏颇。因为不能在教师们中推行自己的计划，校长只能全然放弃。实施课程评估的教授们只提出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课程方案，他们只希望通过改革取悦学生，又可以避免教授之间学术派系争斗。文理学院是否接纳这份无关痛痒的课程改革方案，将是对哈佛在美国高等教育界领导地位的考验。各大学的领导者一直把哈佛的课程改革当成效仿的典范，新闻媒体也把哈佛课程改革作为预测学术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初步迹象表明：哈佛即将实施的那些毫无活力的新课程将在2006年初被抛弃。

私立大学在美国社会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位，他们成为社会契约的受益者。作为私立大学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回报，私立大学享受了免税待遇和学术追求的自由。因此，这些大学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公众有理由对其是否能坚持自己的使命提出质疑；人们怀疑这些大学是否能为美国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公民提供优质教育环境。

相对课程改革的争论而言，围绕大学与学生关系的争辩要低调一些。但是4对受教育者而言，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既然学生来到了收费昂贵的大学，为什么满足这些学生及其家庭合理的期望、通过协商方式使其获得学位并顺利进入成人世界那么困难？师生沟通、教学、咨询方面的问题由来已久，从19世纪哈佛及其他一些无所作为的殖民地学院开始，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历史上那些受到盛赞的教授们，既是杰出的教师，也是伟大的学者，而有些盛传确有其事。但是，研究型大学并没有规定教师与本科生之间应该建立何种关系。当学院发展成为大学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百年多前大学里所发生动荡的后遗症。

的确，这种后遗症正在滋长，而不是在弱化。教授受聘成为学者和教师，却不能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价值观，他们不是传道解惑者。大学没有指望教授来帮助学生，却聘请咨询师和辅导员来完成教育任务。学校甚至以学生互助的方式，让学生来完成原本属于教授的教育工作，学校居然以这种释放教授责任的做法而自豪。同时，政府官员却不停夸耀教授们是学生真正的导师。对于那些以